

# 文本的角色

——关于强制阐释的对话

张江 伊拉莎白·梅内迪 马丽娜·伯恩蒂 凯撒·贾科巴齐

---

**内容提要** 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也是其根本缺陷所在。理论与文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阐释是否有边界?什么样的阐释才是确实合理的阐释?这些都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密切关注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与流变,针对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的问题及中国当代文论和中国阐释学的构建,提出“强制阐释”这一概念,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近期,张江教授与意大利摩德纳大学语言文化学院的伊拉莎白·梅内迪(Elisabetta Menetti)在编研究员、马丽娜·伯恩蒂(Marina Bondi)教授、凯撒·贾科巴齐(Cesare Giacobazzi)副教授进行座谈,围绕文本的角色和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现状等主题展开讨论,现整理出这篇对话,以飨读者。

---

## 一、阐释学与文本的角色

张江 能够与摩德纳大学的各位专家学者就阐释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讨论,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在此之前,我已分别与英国几所大学和意大利都灵大学的同仁就阐释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多次座谈和讨论,受到很多启发。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与都灵大学的教授们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在对阐释学相关问题的理解上,我们的许多想法更接近于意大利阐释学传统。大家在讨论中反复涉及的一个问题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传到了中国,对中国文艺理论的建构和文学批评传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

对我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冲击。但是,确实有一些学者在学习借鉴西方文艺理论的过程中,理解和认识上发生了一些偏差,经常简单地照搬、照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强制阐释当代中国文学实践及文本。

意大利著名学者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在中国非常有影响。1979年,他曾在剑桥大学与一些学者辩论阐释学的相关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们对艾柯的《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等小说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并且分别从不同视角给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阐释。但是,对于一些阐释和解读,艾柯本人并不认可,对它们进行了反驳和批判,因为这些阐释、解读与他本人的想法(意图)相去甚远。基于这一情况,艾柯提出了“过度诠

释/过度阐释”(overinterpretation)这一重要概念。

但是,我们在深入分析和研究百年来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和流变后发现,“过度诠释”这个概念还不足以充分表达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诸多理论与思潮在阐释方面的根本性缺陷。按照艾柯的说法,过度诠释主要表现在:某个读者或批评家对艾柯小说中的某个情节、某个段落或某个人物,作出与艾柯本人意图不相符的阐释。譬如,艾柯有一本小说,叫《傅科摆》(*Il Pendolo Di Foucault*)。在撰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他就想过,一定会有一些读者或自作聪明的批评家在“Foucault”这个名字上大做文章,把发明傅科摆的物理学家“Foucault”与20世纪的哲学家、思想家“Foucault”联系起来,作出不合艾柯本来意愿的阐释。

虽然过度诠释这一概念揭露了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艾柯所说的过度诠释主要还是指从文本本身出发,对文本本身所包含的一些内容,作出一些延伸理解。但是,在我们看来,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基本倾向和主要方法不是过度诠释,而是“强制阐释”(imposed interpretation)。

我在提出“强制阐释”这一概念和命题之初,就作了这样的界定:所谓“强制阐释”,其基本特征在于,“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置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强制阐释论》,载《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也就是说,一个阐释者以前置的立场、前置的模式,对这个文本作符合阐释者目的与理论立场的阐释,用文本来证明其理论和立场的正确,从而将文本本身当成表达自己思想和理论的一种手段。众所周知,女权主义本身不是什么文学理论,而是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也可以说是妇女解放与反抗男权主义的一种实践。但是,一些文艺理论家和女权主义者,为了扩大其理论的影响,将女权主义这一社会理论征用于文学场域,创生出女权主义批评,以此对所有的经典文本进行符合女权主义主张的阐释。比如,他们可以用女权主义去重新阐释《哈姆雷特》,重新阐释古希腊的神话,或者用女权主义的主张去重新书写文学史,把是否符合女权主义主张作为评判文本和文学史的标准。再如,有的批评家用同性恋理论,把中国古代

诗人屈原阐释成一个同性恋者;有的批评家利用生态理论,把陶渊明的诗阐释成具有当代生态主义内涵的诗。如果用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说法,我们甚至可以依照某些理论,在莎士比亚的文本当中找到关于核战争的阐释。

这种运用某个现成的理论强制扭曲或裁剪一个文本的阐释方式,与艾柯所说的过度诠释已经完全不同了。这种阐释方式,是将阐释者的理论强加给文本,强加给作者,所以我们将其称为强制阐释。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主要思潮、主要学派的发展历程,看一看那些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们的著作,会发现他们的阐释方式有着明显的强制阐释的特征。强制阐释是20世纪开始出现的,然后逐步扩张泛滥,成为在当代西方文论领域具有普遍性的阐释方式。为了实现其理论目的,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口号与观点,比如说“作者死了”,然后否定文本本身具有相对确定的意图,接着又把批评家混同于普通读者,以为批评家可以跟读者一样,作各种背离文本的解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作者死了,文本死了,读者也死了。那还有谁活着呢?就只剩下理论和理论家活着了。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以理论为中心或理论主宰一切的时代。

当以理论为中心的时代来临时,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就彻底脱离了文学实践,理论自己制造自己,自己发展自己,自己检验自己。无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批评理论,已经和文学没有任何关系,于是就出现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和没有文学的文学批评。文学只是文学理论的一个脚注,或者不过是证明文学理论的一个工具而已。

强制阐释是一个具有一般性和综合性的概念,涉及到一系列重要、基本的文学问题,如作者和文本的关系、文本的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关系、批评家和文本的关系,等等。许多文学领域的基本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认真讨论。

通过梳理艾柯的思想发展脉络,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1962年,艾柯发表《开放的作品》(*Opera Aperta*)时,主张文本阐释的无限性。二十多

年后的1990年,成为小说家的艾柯在剑桥大学丹纳讲座上,却主张对文本的阐释加以限制,并对“无限衍义”的过度诠释进行斥责。他认为一定存在某种对诠释进行限定的标准,而把自己以前曾经主张的对文本的无限诠释、无限理解斥之为神秘主义。艾柯自己关于文本阐释观点的反复,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启发:这是偶然的吗?20世纪整个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进程是不是也是这样?而正确的或者相对正确的落脚点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

我与意大利都灵大学的几位教授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讨论过程中,我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觉,就是在阐释学问题上,意大利学派或者说都灵学派,有更多的合理观点。在我们看来,意大利学者提出的许多观点和想法,应该比伽达默尔、海德格尔、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德里达、罗兰·巴特等人更接近真理。

梅内迪 感谢张江教授十分有趣也非常富有启发性的发言。在意大利,文学研究是以文本为中心的,文艺理论研究者对文本作了大量的深入研究。意大利的文艺理论具有明显的人文主义研究、语文学研究和“互文性研究/文本间性研究”(the study of intertextuality)倾向。当然,在意大利的文学研究领域,也还存在其他理论学派。

艾柯、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及其他著名的意大利文学家认为,文艺理论是文本的集合体或文本的总和——包括各种各样的文本、引用和多种多样的诠释。这种文艺理论以及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的文学批评理论产生了很深的影。值得注意的关键词有:互文性(比如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所进行的研究)、接受论(姚斯)以及对话性(巴赫金)。对于艾柯和其他意大利学者来说,文学研究的传统十分重要。这意味着要深入地研究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及18、19世纪的文本,尤其要注重对但丁(Dante Alighieri)、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与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等著名作家的文本的研究。无论研究对象是古典文学还是当代文学,对文本本身的深入研究以及对文本的互文性研究,在意大利文学

理论研究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意大利,文学接受论也受到语文学传统十分深刻的影响,这在艾柯的思想中也有所体现。

近年来,意大利文艺理论界还出现了认知理论、神经叙事学等新的理论流派。它们来自美国,更关注文学的科学性与文学的认知性。因此,这些理论思潮是与意大利文本研究的传统相背离的。当然,相对于语文学与人文主义来说,这些理论思潮的影响范围是比较有限的。

关于文本的阐释,意大利学者受艾柯理论的影响很深。不少人认为文本是开放的,可以进行多种不同的解读。但是,语文学、历史学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每个文本都受历史与语文学背景的制约,从而对主张阐释无限自由的观点形成了遏制。比如说,在意大利,对于古典文本并没有出现过分“现代化”的阐释。

在意大利新批评理论的发展中,如何平衡文本开放阐释的优势与劣势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挑战。开放阐释的优势在于文本的开放性和阐释的多样性。其劣势在于,对于理论的过度热爱,容易导致背离文本思想本质的错误解读。文学理论的健康发展,必须在极端的语文学传统与极端的文本阐释现代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应当说,艾柯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另一位将二者结合起来的,是伟大的博洛尼亚理论批评家艾齐奥·莱伊蒙迪(Ezio Raimondi)。他不仅保持了传统语文学的精神,重视文本的解读,而且也主张对文本进行自由开放的阐释。他对语文学的研究渊博精深,同时富有创造力。在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人们有很长时间把重点放在作者身上,也有很长时间把重点放在读者身上。

张江 意大利这个学派观点似乎更符合文学本身发展的需求,也比较符合我们的想法。

梅内迪 在意大利,文学研究的主线是历史语文学研究。今天我们可以说,意大利主要有三个学派:关注文本(语文学)、关注历史(文学史)以及新文学理论与新语文学相结合的多元化研究。近年来,意大利的中学对文本分析与阐释教学非常看重,增加了文本阐释的相关课程。在文学类高中,学生们会学习修辞学、文本分析、叙事分析等课程。而

艾柯和卡尔维诺所侧重的读者阐释分析与多元化阐释,则主要会在大学文学课上讲授。高中的学生更多地分析片段化的文本,而不是完整的文本。在大学里,则会有文本接受理论等课程。艾柯和卡尔维诺更关注文本总和与文本多元化,更关注读者。

作为古典文本的研究者,我认为文本没有唯一的真相,其真相是多元的、复杂的。读者发现文本,与文本相遇,并对文本进行探索。读者受现实的影响,而现实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也是变化的。

文学批评的任务之一是从其内部本质出发,讨论文本的意义:修辞与词汇的音乐性、词语与概念的历史意义、时代的不同以及角度的改变。

文本是一个动态场,作者与读者在这里进行互动,而作者与已经存在的文本之间也有互动。研究应该向两个方向开放:文本的接受(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与互文性(文本与其他已经存在的文本之间的关系)。关系与关系之间相关联,这是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而这个理论对艾柯的影响也非常深。

批判阐释是对“处于交流中”的文本进行翻译。这一交流不会停止,总是有空白处,总是有不同的地方,解读的过程似乎从不可能停止。

作者与解读者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争议,这尤其体现在艾柯的思想中:在姚斯1967年提出接受理论之前,艾柯1962年发表了《开放的作品》,创建了意大利的语义学,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读文学的方法。

## 二、何为确当合理的文本阐释

张江 您刚才说了,必须在文本阐释的语文学传统与文本阐释的现代化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平衡点。那么,这个正确的平衡点是什么呢?

梅内迪 这需要考虑文本的语文学背景与历史背景,对文本进行不乏创造性的解读。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多元化的折衷。比如说,我要分析一个中世纪的文本,当然可以使用现代理论,但同时,必须把文本放到中世纪的背景中来,将当时围绕在文本周围的其他文本也考虑进去。结合当时的历史语

文学背景,我可以对传统理论作一些创新。

张江 如果可以有多种阐释,是不是有一种阐释更确当合理呢?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有一个平衡点,那个平衡点是什么?确当合理又在哪儿?

伯恩蒂 你们与我们意大利学者讨论寻找平衡点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西方人都说,平衡与折衷的方法应该到东方去寻找。当然,在文本阐释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阐释可以是多样的,但还是有一定的界限。

张江 我们很愿意听听你们关于阐释界限的看法。

梅内迪 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Lezioni Americane*)。这本书讨论了语文学传统与对文本的创造性解读。

张江 那什么是忠实于文本的阐释?

梅内迪 忠实的阐释需要考虑到文本的互文性。对我们来说,文本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并且有深度的。因此,正确的阐释需要尊重文本的互文性。

张江 那么,开放的阐释和无边界的阐释会不会是全面深入的阐释?

梅内迪 为了使阐释更加正确,应该考虑文本的深度,必须与历史文本结合,同时具有创造性。我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来看这三个文本:17世纪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Don Quixote de la Mancha*)、莎士比亚的《奥赛罗》(*Othello*)以及16世纪意大利小说家吉拉尔迪·钦齐奥(Giraldi Cinzio)的《一位摩尔上尉》(*Un Capitano Moro*)。这些文本是由一条叙事链条连接起来的。故事的源头在意大利,后来传到欧洲其他国家,成为整个欧洲的故事。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对其所叙述的古老的意大利故事,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作了重新阐释,或者说进行了再创作。而今天的读者,仍然能够在这些故事中看到新的东西。故事仍然是古老的故事,但它却是反映当下的,与当下的现实相联系。这种联系产生了新的真相,而这个新的真相与我们相关。读者的背景各不相同,他们的诠释也是多元性的。不过,这里所说的多元性是由文本的总和所赋予的。现在,我们有钦齐奥、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所创造的三个微观世界,这些文本的总和以

及我们当下的解读。更正确的阐释需要结合这三个世界与我当下的解读。而这正是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里所提到的。他的观点是,在从古典到现代的文本中寻求“轻盈性/轻逸性”(lightness)。轻盈性旨在寻求看待世界的一种新角度。由于受沉重生活的困扰,在对世界的看法上,人们形成了根本性的刻板成见,而这种成见阻碍了人性的解放。寻找轻盈性,是对于固有框架的解放,在自由想象中强调人类行为的不可预见性。我认为,绝对的正确是不存在的。更正确的阐释能尊重语文学与历史背景,但一些不完全忠实的阐释也能让文本获得重生。

张江 您又使用了“忠实的阐释”这个概念,可以说很清晰,也很重要。那么请问,什么是忠诚或忠实的阐释,也就是说,忠诚的标准是什么?

伯恩蒂 或许我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一说。对语言学家来说,哪个是更正确、更忠诚的文本解读其实并不重要。我们更加关注解读的边界在哪里,而这些边界就是文本的足迹,它们限制着文本的解读。对于一个文本可以有多种解读,但总是有底线的,因为文本有自己一定的足迹。有时我觉得自己对一些文本的解读是强制性的,因为我找不到文本的足迹。我所说的强制性,是指找不到文本足迹与证据去获得一个能说服自己的解读,而只能是退而求其次作出的一种强制性的解读。不过,对于语言学家来说,文本可以有多种方式的解读,虽然文本内部关系复杂多样,有模棱两可的成分,但边界总是存在的,由文本足迹所限制。在语言学家看来,文本是最基本的。

张江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有一句诗很有名,大意是“诗人如何不欢愉”,原文为“A poet could not but be gay”。如原文所见,他在诗句中用了“gay”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当时是指欢愉、快乐的意思。但是,当下的同性恋理论,硬要用“gay”的当代语义来阐释此句,把它说成是同性恋的意思。请问,这是不是忠诚于文本的理解?如果阐释是无限的,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阐释,那么阐释距离这个“忠诚”到底有多远?如果伯恩蒂教授说阐释是多层次的,但是有边界的,那么这个边界在哪里?后人对“gay”这个词作出与同性恋相关的阐释,这

个阐释是忠诚于文本的吗?我同意关于阐释是有边界的说法,但是不清楚这个边界究竟在哪里。

梅内迪 张江教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非常尖锐,也非常重要,尤其对古典文本的研究者来说更是如此。在古典文本的研究中,会碰到许多古老的词汇。比如,当我们说到“宫廷文学”(letteratura cortese)时,“宫廷”(cortesia)是主题,但“宫廷”这个词需要解释,因为其含义在不同时期是有所变化的。而对于现代文本来说,词汇的含糊性变小了。虽然解读起来也会有一定的问题,但难度要小很多。在意大利,一个词的含义从古意大利语到当代意大利语是如何演变的,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有很多,在意大利学界居于很重要的地位。在文学阐释中,关键的一点是要考虑到一个词的多种解释。

我再举一个例子。卡尔维诺谈到了轻盈性。那么,什么是轻盈性?是用新的方式去写作、去相信的能力。词语能轻盈地飞翔,读者也能随着想象飞翔。他用关于轻盈性的理论去分析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e)的作品。他把这一哲学思想应用到了拉丁文本的解读中来。奥维德本人可能从来没想到过什么轻盈性的理论,但是卡尔维诺却从这一角度出发,用奥维德的文本去阐释什么是轻盈性。他在古典文本中找到了轻盈性,也将其应用到了当代文本中。艾柯也做着同样的事情,即在古典文本中寻找能够带来当下想象的力量。

张江 回到您刚刚说的,正确的阐释或者说忠诚的阐释需要从文本中去寻找,那么忠诚的对象在哪里?是在文本里还是在阐释者的脑袋里?如果是在阐释者的脑袋里,那么这个东西是谁给他的?您说的这个理论非常典型。阐释者的脑袋里有个思想叫作轻盈的世界,他用这个想法到古老的文本中去寻找这个世界,那么这是忠诚于文本的做法吗?文本当中真的有关于这个轻盈的世界的思想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文本里有一个意图,是忠诚的对象,那么这个意图在哪里?这个意图是谁给的?因此,我建议过渡到下一个关键词即“意图”,讨论一下“意图在不在场”这个问题。

梅内迪 这个题目十分有意思,我非常乐意就此作进一步探讨。

### 三、阐释学与对话

贾科巴齐 这是一个我非常关注的话题。多年来,我一直从事与阐释学相关的研究。我非常高兴能与各位讨论这个话题。我在德国学习的阐释学,我所师从的德国学者跟艾柯的主张有所不同。在我看来,语义学采用了许多科学领域的范畴和方法,而科学性在阐释中非常重要,对于文学文本的阐释更是最基本的,不论是在语文学还是在语义学的传统中都是如此。

我所理解的阐释学与20世纪的哲学思潮相关,就是将阐释看成一种自由的空间,在这里面,矛盾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受欢迎的。这种阐释理论的基础之一,是德国的小说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不同的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这看起来似乎与科学性相矛盾,但实际上并不冲突。每个人都应该以科学的态度,结合自己的认识,去发掘不同的理解,去面对阐释的冲突。因此,文本的意义在于能够激发不同的解读。但是,这些不同的解读之间需要对比与对话。这里关于真理的概念与科学关于真理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这里所说的真理,只存在于对话的过程中,存在于不同的立场中。此外,其认知维度与科学的认知维度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旨在发掘文本里的新东西,即可以被现实化的东西。比如说,伯恩蒂提到的文本足迹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对于阐释学课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去发现新的足迹和新的可能性。

最后,我想说一下轻盈性。一个文本是轻盈的,是因为每个读者都有可能去理解文本的一部分,而无需知道得十分全面。卡尔维诺还有一个主张,即作者就是读者。作者在其他文本的读者,而作者将这些文本带到了自己的作品当中。因此,在文本中是很难找到一个源头的。

张江 你刚才所表述的也是伽达默尔的观点,即各种各样的话语在协商中达到了协商的目的。那么,对话的目的是什么?对话的结果是什么?为什么要对话?对话的结果是什么性质的结果?

贾科巴齐 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的一个关键词

是“经验”在文本中获得经验,在文本中发现之前不知道的东西。这个协商的框架并不是要获得一个确定的结果,而是要保持其不可预知性。伽达默尔有一个比喻:我们行走在地平线上,在行走的过程中,我们总能看到新的东西,总能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待事物,去看待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和我们一起行走,从不停歇,也不会静止在教科书的解读里。

张江 那就是说,对于一个确定的文本,比如说五百年前的那个文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包括您本人,今天和明天对于这个文本的解读是不确定的,今天和明天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贾科巴齐 是的,因为文本依赖于我们的感知,依赖于我们的日常经验以及在文本中获得的经验。如果我们的日常经验发生变化,文本经验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对于文本的解读也会发生变化。如伽达默尔所言,我们一直都在行走。

张江 那就是说,对于一个文本的理解,对于一个文本的阐释,是有限的,也是没有边界的。

伯恩蒂 并不是没有边界,因为有文本和语境,以及对于文本和语境之间关系的解读。边界是存在的,但是会随着语境的改变而产生变化。

贾科巴齐 我同意伯恩蒂的看法。科学的思考方法让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来进行沟通,而阐释学则让我们能抓住未来的我们、变化的我们、不同的我们以及不同的思考方式。

张江 我同意您说的,即科学的理解和阐释学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人文科学领域,对于基本的文本,比如说对一首诗,今天的理解是这样,明天的心情变了,理解可能也就不同。也就是说,随着心情和语境的变化,文本和阐释可以被不断地颠覆。那么问题在于,这样不断变化的理解或解读有边界吗?如果没有边界,我们当然可以变化,进行任意的表述与阐释。人的经验是无限的,用无限的经验对确定的文本做无限的阐释,其合理性以至合法性是不是应该有更充分的论证?如果是有边界的,无限的阐释又该如何处理?

贾科巴齐 阐释边界是由人们所处的条件与状况造成的。人们总是试图去寻找文本的意义,但意义存在于协商关系中。思想的边界与局限性来源于人本身。真理不是通过别人告知而获得,它要由

我们自己去探索,即通过对话、协商而获得。没有冲突,就没有自由。

张江 如果阐释是无限的、没有边界的,那么是不是还有必要在两个不同的极端之间寻找你们所说的平衡点?

梅内迪 问题在于文本的诗性。我们的语言具有自己的诗性。如果我看到草地是绿色的,其他所有人也看到是绿色的,那么客观上草地是绿色的。这时来了一位诗人,说草地有着静谧的绿色。这当然是诗性的比喻,但能说这种感受变成一种确切的科学,是所有人都接受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们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有各不相同的感受。根据谁在阅读,以及在什么时间阅读,文本也是变化的。所以说,文学是一种不具有确定性的科学。

张江 我同意您的看法,但您说的并不是贾科巴齐先生所说的无限性。因为按照贾科巴齐先生的说法,今天说草地是绿色的,明天可以说草地是蓝色的,后天又可以说草地滴满了鲜血。那么,对于文本自身的表达,草地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贾科巴齐 这里面有一种暗示性。关于说草地是绿色或者蓝色的,我有着自己的经验,但我的这些经验是不可翻译的。为了和他人沟通,与他人达成一致,我可以用逻辑话语表达出来。因为思想状态是没有语言的,所以我用一种逻辑话语去解释,去翻译,去和他人沟通我的想法。而在这个翻译过程中,语言表达是会改变的。这也是美学文本的一个特点,它是不确定的,也是不可翻译的。我们总是需要去寻找新的翻译。

张江 您的观点也是伽达默尔所坚持的观点。海德格尔认为文本阐释没有边界,坚持阐释无限的观点。而伯恩蒂先生的观点是传统语义学的观点,就是说对文本可以有多种阐释,但阐释是有边界的。

贾科巴齐 阐释是向更多的可能性开放的,边界是由说话人、话语“共同体”(community)和读者

来协商确定的。对自己思想的监视由他人施行,由对话施行。

张江 那您之前不是说协商是没有目的的吗?

贾科巴齐 为了能够互相对话,需要达成一致,找到共同点。虽然一开始沟通双方会有不同的意见,但看到对方的言行后,会进行思考,然后修改自己的意见。

张江 在对话当中产生边界,读者们通过对话讨论,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对话的目标。通过对话,产生对文本的大致理解与认识,这个认识就是大家认为的可能的确定意义。这就是协商对话的目标和结果,不是说没有目标和结果,也并不是没有边界,或可以作无限的解读和阐释。不知您可否就阐释有没有边界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

贾科巴齐 非常乐意。

张江 我在摩德纳有着与在都灵完全不同的感觉。好像这里各位学者的观点更接近德国学者的想法,或者说更多是德国的观点,伽达默尔的观点,也是艾柯前期的观点。而在都灵,学者们所持的更多是艾柯后期的观点。

梅内迪 我认为您说的没错,我们这里更倾向于融合传统语文学和文本接受学的观点。从整体上来说,我们的观点是多元化的。

张江 今天的讨论很有意义。其中核心的一点是,阐释是有边界的,而边界是变化的。我认为,这似乎就是一个平衡点。希望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母题,通过对话等各种交流形式,继续深入讨论下去,以不断扩大我们之间以及学界同仁之间的共识。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摩德纳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 李松睿